

论因明学史上的一次僧俗之争

沈海波

〔摘要〕 在因明学传入汉地的初期,人们对因明学的理解和认识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尚药奉御吕才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3卷,对玄奘法师门下三位大德疏解《因明入正理论》的著作提出了广泛的质疑,由此引发了一次关于因明僧俗之争。本文对这次颇为著名的僧俗之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对学术界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

〔关键词〕 因明;吕才;玄奘;因明入正理论《因明注解立破义图》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4—0070—07

〔作者简介〕 沈海波,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200444

一 僧俗之争的起因

唐初,玄奘法师译因明大小二论之后,其门下诸大德各据玄奘法师之义,造为文疏。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玄奘法师门下栖玄法师将《因明入正理论》抄送幼时之友吕才,并附书云“此论极难深究玄妙,比聪明博识,听之多不能解。今若复能通之,可谓内外俱悉矣!”^①吕才时任太医署上药奉御,以博学著称于当时。此前,栖玄法师尝讥其云:

檀越复研味于六经,探赜于百氏,推阴阳之愆伏,察律吕之忽微。又闻生平未见《太玄》,诏问须臾即解;由来不窥象戏,试造句日即成。以此有限之心,逢事即欲穿凿,但以佛法玄妙量,谓未与彼同,虽复强学推寻,恐非措心之所,何因今将内论翻用见讥者乎?^②

吕才耻于被试不知,于是对《因明入正理论》强加披阅,并借得神泰、靖迈、明觉三法师的义疏,仔细研读。由于因明初入汉地,所以三法师虽皆师承玄奘法师,但因为翻译以及理解等方面的原因,三部义疏互相间颇多歧义。吕才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并以此为契机,撰《因明注解立破义图》3卷。

吕才《因明破解立破义图》问世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很多学者对其表示了推崇,但佛门弟子却反应强烈,并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慧立致书左仆射于志宁曰“近闻尚药吕奉御,以常人之贤,窃众师之说,早因明图,释宗因义。”“然奉御于俗事少闲,遂谓真宗可了,何异鼯鼠见釜灶之堪陟,乃言昆阆之非难;蛛螫睹棘林之易罗,亦谓扶桑之可网。不量涯分,何殊此焉!”^③明浚致书太常博士柳宣时亦曰“寻夫吕公达鉴,岂孟浪而至此哉。示显真俗,云泥难易,楚越因彰。佛教弘远,正法凝深,譬洪炉非掬雪所投,渤澥岂胶舟能越也。”^④他们的措辞都很尖锐。由此,也引发了一次关于因明的僧俗之争。

对于这次僧俗之争,学术界虽然已经做过比较多的研究,但有些地方似乎还存在着误区,所以

① 《大正藏》第50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8卷,日本,1934,263上。

② 《大正藏》第50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8卷,日本,1934,263上。

③ 《大正藏》第50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8卷,日本,1934,263上。

④ 《大正藏》第50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8卷,日本,1934,265中、下。

这就要求我们做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要进行探讨的问题是,《因明注解立破义图》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为什么这部书会招致佛门弟子如此强烈的反应。

二 吕才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的目的

吕才的著作附有一张图,即《因明注解立破义图》(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六简称为《破义图》),因此图最为惹人瞩目,时人遂以此图之名统称其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八)。而其书之本名,据日僧凤潭《瑞源记》卷二及书末所附书目记载,为《立破注解》。对于这张“义图”,有学者认为“吕才用义图勾画出了因明的整体结构,并在稍难的地方加以注释,使得因明理论变得更加易学,为初学者提供了方便,更便于入门直接领悟其要旨。”^①此说不知何所据而云。从吕才此图有“立破”的名称即不难推知,所谓的“义图”,是立破各种有关《因明入正理论》注解的,而不是在勾画因明的整体结构。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吕才《因明注解立破义图》是对三位法师注疏中相互间的抵牾之处进行针砭的著作。^②笔者以为此说尚不尽然。

表面上看,吕才是受到栖玄法师的刺激才发愤钻研因明论的,但其著书的真实意图尚需仔细探究。玄奘法师门下诸大德在若干问题上存在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之间也经常互相进行诘难,现在被吕才指出,当不至于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明浚曾指责吕才“研机三疏,向己一周,举非四十,自无一是一。”^③诸大德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吕才只是在缕举这些分歧,那么这种指责显然就不成立了。基于这一判断,笔者认为吕才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的用意并不在于指出三法师注疏中的分歧。《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今已亡佚,所以此书的具体内容已不可得而知。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零星的材料,对此书的撰述意图作些分析。

吕才曾自述其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的经过,曰:

后复借得诸法师等三家义疏,更加究习。然以诸法师等,虽复序致泉富,文理会通,既以执见参差,所说自相矛盾。义既同禀三藏,岂合更开二门?但由衅发萧墙,故容外侮窥测。^④他认为三法师既然师承玄奘法师,那么就不应当互生歧见,自相矛盾;他因此进而认定他们之间矛盾的存在,是由于玄奘法师所传授因明理论存在着缺陷,所以他有了进行大胆挑战的意图。这就是“但由衅发萧墙,故容外侮窥测”所蕴含的寓意。吕才又云:

才以公务之余,辄为之注。至于三法师等所说善者,因而成之;其有疑者,立而破之。^⑤可知吕才对三法师注疏的正确性是持否定态度的,所以他虽然也吸纳了三法师的部分观点,但着重点却是在破斥三法师的注疏,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为《因明入正理论》作注。

吕才作为俗家学者,在没有师授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研读来为《因明入正理论》作注,这本应受到欢迎,即便出现不少的错误,也还是可以原谅的,何以慧立、明浚等人会对其大加斥责呢?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僧徒们把自己放在掌握真谛的地位上,而视吕才为异端。^⑥笔者以为此说不然。如果当时确实出于上述目的而对吕才进行攻击,则诸大德之心胸未免太过狭隘,并且亦不符佛家之风范。在唐代初期颇为宽松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中,排斥异己的行为恐怕要为学界所不齿。

笔者认为,吕才撰《因明注解立破义图》的目的,是要以自己的观点推翻三法师的注疏,并进而挑战玄奘法师在因明学方面的宗师地位。吕才自叙其书之体例曰:

其间墨书注者,既是论之本文;其朱书注者,以存师等旧说;其下墨书注者,是才今之新撰,

① 张晓翔《论吕才对因明的贡献》,《国际因明学术研究会会议交流文集》杭州2006年,第155页。

② 李匡武《中国逻辑史·唐明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③ 《大正藏》第50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8卷,日本,1934,265上。

④ 《大正藏》第50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8卷,日本,1934,265上。

⑤ 《大正藏》第50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8卷,日本,1934,263上。

⑥ 李匡武《中国逻辑史·唐明卷》第82页。

用决师等前义,凡有四十余条。^①

由其体例亦可知其书为《因明入正理论》之注疏。《因明入正理论》仅两千言,而吕才居然能够指出三法师的错误达40余条,这说明吕才所阐释的因明学体系从根本上是有别于三法师的。明浚曾列举了《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中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吕才对因明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宗、因、喻等都未能正确地予以掌握(这一点笔者在下文再作详细分析)。概念都不能正确地掌握,对原典的理解不可能不出现重大的偏差。而吕才也正是基于他的那些错误的理解,对三法师的注疏提出了批评。

笔者认为,吕才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是通过批评三法师的观点,试图建构有别于三法师的新的因明学体系。这一点可以从吕才的自叙中得到证明,吕才曰:

至于文理隐伏稍难见者,乃画为义图,共相比较;乃更别撰一方义图,独存才之近注。^②

所谓“文理隐伏稍难见者”,当指吕才所自认为的三法师注疏中存在的问题。三法师的《因明入正理论疏》今皆不存,不过从残存的神泰《正理门论述记》看,神泰所阐述的因明学理论还是比较严谨的。所以有学者评论道:“神泰在释异品时批评‘相违论’者,他抓住以相违为异品‘不能返显宗定随因’的症结进行剖析,甚为深刻。”“神泰的《述记》问世较早,其阐释多为后出的疏记所吸收。如窥基《大疏》中关于宗因宽狭配合关系的阐述,就基本上取自《述记》,连文句亦颇雷同。《述记》的价值于此可知。”^③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三法师的注疏并不存在吕才所认为的大量错误。

三法师所著关于《因明入正理论》的疏记,均师承于玄奘法师,他们的阐释虽有出入,但整个体系还是一脉相通的,所以,吕才的立破虽然表面上是针对三法师的,但其矛头却直指玄奘法师。吕才自叙其书曰:

《论》既解无人解,无处道听途说,若言生而知之,固非才之望也。然以学无再请,尚曰传灯,闻一知十,方称殆庶。况乎生平不见,率尔辄事含毫,今既不由师资,注解能无纰紊?窃闻雪山夜叉说生灭法,丘井野兽叹未曾生。苟令所言合理,尚得天仙归敬。才之所注,庶几于兹。法师等若能忘狐鬼之微陋,思句味之可尊,择善而从,不简真俗,此则如来之道,不坠于地。弘之者众,何常之有,必以心未忘于人我,义不察于是非,才亦扣其两端,犹拟质之三藏。^④

吕才显得相当自信,虽自谦“微陋”,但却坦白地表明要“质之三藏”,毫不含蓄地向玄奘法师提出了直接的挑战。

吕才的这篇叙无异于宣战书,佛家弟子当然不能不作出强烈的回应。由此可见,正是吕才的激烈攻击,并挑起辩论,才是导致这场僧俗之争爆发的主因,而非佛家弟子不能容忍异见。

三 僧俗之争的经过

唐初,玄奘法师在佛学界居于宗师和领袖的地位,在因明学方面更是具有权威性。因明学是佛家的方法论,也是当时佛家与道家进行论战时所倚仗的利器。现在吕才对玄奘法师所传因明学体系提出挑战,势必引起人们对佛家方法论的怀疑,也会影响到玄奘法师的宗师地位。慧立指责吕才曰:

不能精悟,好起异端,苟觅声誉,妄为穿凿,排众德之正说,任我慢之偏心。媒炫公卿之前,器喧闾巷之侧,不惭颜厚,靡倦神劳,再历炎凉,情犹未已。^⑤

他一方面指出了吕才对《因明入正理论》的理解与诸法师截然不同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他对

① 《大正藏》第50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8卷,日本,1934,263上—中。

② 《大正藏》第50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8卷,日本,1934,263中。

③ 沈剑英《中国佛家逻辑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1、93页。

④ 《大正藏》第50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8卷,日本,1934,263中。

⑤ 《大正藏》第50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8卷,日本,1934,263下。

吕才“媒炫公卿之前”这种四处炫耀的造势做法极度不满。明浚亦云:

吕奉御……比因友生戏尔,忽复属想因明,不以师资,率己穿凿,比决诸疏,指斥求非。諠
议于朝廷,形言于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难加。核其志也,诚为可惑。^①
同样表示了对舆论倾向的担忧,并直斥其志可惑。笔者以为,慧立和明浚所表示的不满和担忧,才
是佛家弟子对吕才《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作出强烈回应的主要原因。

《因明注解立破义图》问世后,确实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极大反响,舆论对诸法师极为不利。太
史令李淳风讥讽众僧曰:

仆心怀正路,行属归依,以实慧为大觉玄躯,无为是调御法体……然贤僧阐法,实俾天师妙
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敢以黄茱为金,山鸡成凤,南郭滥吹,淄渑混流耳。^②
太常博士柳宣亦作《归敬书偈》以激众僧。文曰:

尚药吕奉御……立破因明之疏,若其是也,必须然其所长;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短。今见
僧徒云集,并是采石他山,朝野俱闻。吕君请益,莫不侧听……然吕君学识该博,义理精通,言
行枢机,是所详悉……但以因明义隐,触象各得其形,其器饭有异色。吕君既已执情,道俗企望
指定。^③

从他们的言辞中可以看出,人们已经对以大慈恩寺为代表的佛家弟子所使用的方法论产生了直接
的怀疑。唐初,正是佛家与道家之间的论战进行得极为激烈的时期,因明学是佛家当时引以为自豪
的辩论工具,由于中国古代的传统逻辑思想不甚发达,所以佛家往往能够借助于理论体系较为严密
的因明学,在论战中取得优势。^④吕才《因明注解立破义图》的出现,使很多人因此对玄奘所传因明
学的正确性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这显然是佛家弟子所不能容忍的。而且,柳宣所谓“吕君既已执情,
道俗企望指定”的话,已迫使诸法师不得不对吕才《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作出回应了。

由于僧俗双方立场对立,书檄往来已势同水火,官司甚至打到了唐高宗处,最后唐高宗不得不
亲自出面加以干预,让玄奘法师与吕才当面进行辩论。史载:

癸卯,宣得书,又激吕奉御,因奏其事。敕遣群公学士等往慈恩寺,请三藏与吕公对定。词
屈,谢而退焉。^⑤

有学者说“吕才不得不与诸僧学士共往慈恩寺与玄奘对定,听候玄奘的‘裁决’。”^⑥应当说与玄奘
“对定”是吕才所期望的,并非迫不得已;而将“对定”称之为听候裁决,则显然是对事实有所曲解。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对此事件有稍详细的记载,其云:

初,三藏翻《因明》,译经僧栖玄以论示尚药奉御吕才。才遂张之广衢,指其长短,著《破义
图》……立难四十余条。诏才就寺对论。三藏谓才云“檀越平生未见《太玄》,诏问须臾即解;
由来不窥象戏,试造句日即成。以此有限之心,逢事即欲穿凿。”因重申所难,一一收摄,折毫藏
耳,衮衮不穷,凡数千言。才屈不能领,辞屈辞拜。^⑦

可见玄奘法师对吕才《因明注解立破义图》的错谬之处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批评,“一一收摄”,并使
其辞屈而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初佛家与道家进行过多次激烈的面对面的辩论交锋,作为佛门
领袖的玄奘法师皆未曾直接参预,这次是玄奘法师归国后唯一一次亲自出面与人辩论,足见其对此
次论定之重视程度。

① 《大正藏》第50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8卷,日本,1934,265上。

② 《大正藏》第50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8卷,日本,1934,264上。

③ 《大正藏》第50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8卷,日本,1934,264上。

④ 沈海波《略论因明学史上的若干问题》,《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

⑤ 《大正藏》第50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8卷,日本,1934,266上。

⑥ 蔡伯铭《吕才与因明》,〔日〕末木刚博《因明新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页。

⑦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六。

四 吕才《因明注解立破义图》的内容

《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久佚中土,日人释善珠著《因明论疏明灯抄》时引过《因明注解立破义图》,说明吕才的这部著作曾流播于东瀛。凤潭《因明论疏瑞源记》未附“因明本支经论疏记总目·震旦著撰目录”有《注解义图》,题注曰“三卷,唐尚御药宾吕才著。”不过,凤潭其实并没有见到过此书,书中所引《因明注解立破义图》系据他书转引。是知吕才此书在日本亦告亡佚。

明浚在答柳宣的《还述书》中曾列举了吕才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曰:

且据生因、了因,执一体而亡二义;能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体。又以宗依、宗体,留依去体以为宗;喻体、喻依,去体留依而为喻。缘斯两系,妄起多疑。迷一极成,谬生七难,但以钻穷二论,师己一心。滞文句于上下,误字音于平去。复以数论为声论,举生城为灭城。岂唯差离合之宗因,盖亦违倒顺之前后。又探鄙俚讹韶以拟梵本啞音,虽复广援七种,而只当彼一转,然非彼七所目乃是第八呼声,舛杂乖讹,何从而至。^①

根据这段话,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吕才犯了以下错误:

1. 不能区分生因与了因;
2. 不能区分生了与听了;
3. 不能区分宗依和宗体,误以宗依为宗;
4. 不能区分喻依和喻体,误以为喻依就是喻;
5. 不懂梵文,误读《因明入正理论》的原文,擅改译文;
6. 误将数论当作声论;
7. 颠倒了合作法与离作法。

以上实际上也就是吕才对诸法师的论疏进行立破时所提出的新见解。当然,这些所谓的新见解很多都是常识性错误。有学者认为明浚所归纳的内容,“不一定即是吕才的错误,何况作为论敌的明浚在援引和归纳材料时还可能曲解吕才论意乃至故意割裂吕才文句,以有利于自己对吕才进行批评。由于吕才的三卷《立破注解》早已亡佚,故很难肯定上述批评中哪些是吕才的错误;论敌方面的责难毕竟是不足为据的”。^②此说不然。明浚的《还述书》可以视作是佛家诸大德回应《因明注解立破义图》的纲领性意见,其中所作各项批评,旁人自可与吕才原书对勘,如有断章取义之处,岂非徒落口实?从玄奘在对定时“一一收摄”的记载分析,明浚的上述批评显然是有其针对性的。

明浚《还述书》只是“试举二三,冀说大意”,所以文甚简略。不过我们参照一些有关的资料,还是可以对吕才的一些主要观点作进一步的了解和分析。

在生因和了因的问题上,吕才认为“言生因者”就是:

谓立论言,既为“了因”,如何复说作“生因”也。《论》文既云“由宗等多言,开示诸有问者未了义故”,说名能立果。既“了”为名,“因”亦不宜别称;不尔,岂同一因之上,乃有半“生”半是“了”因?故立论言,但名“了因”,非“生因”。^③

此说错误明显,主要是吕才未能区分因的狭义与广义之分,故善珠斥曰“此虽实见,义实未通。非直不耻于前贤,亦是无惭于后哲,立言虽一,所望果殊。了宗既得为因生智,岂非所以此乃对所生了,合作二因,难令生、了半分,吕失实为孟浪。”^④

此外,明浚批评吕才时所说“迷一极成,谬生七难”中的“极成”,是指《因明入正理论》“此中宗者,谓极成有法,极成能别,差别性故”,“七难”是形容其谬误之甚。明浚于此未作进一步的展开,

① 《大正藏》第50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8卷,日本,1934,265中。

② 李匡武《中国逻辑史·唐明卷》,第85页。

③ 《大正藏》第68册:善珠·明灯抄·卷二,日本,1934,258中。

④ 《大正藏》第68册:善珠·明灯抄·卷二,日本,1934,258中。

然考窥基《大疏》卷二曰:

或有于此(指“差别性故”——笔者注)不悟所由,遂改论云“差别为性”,非直违因明之轨辙,亦乃闇唐梵之方言。辄改论文,深为呵责。弥天释道安法师尚商略于翻译,为“五失”、“三不易”云。结集之罗汉兢兢若此,末代之凡夫平平若是,改千代之上微言,同百王之下末俗,岂不痛哉!况非翻经之侣,但是肤受之辈,诋后徒之幼识,诱初学之童蒙,妄率胸襟,回换圣教……诸有学者,应闲此义,依旧正云“差别性故”。^①

窥基没有指明究竟是何人擅改《因明入正理论》的译文。慧沼《义断》则曰:

有人云“论云‘差别为性’,言‘差别性故’者非也。其义云何?”答“此亦不然。三藏译本云‘差别性故’,后吕才与文轨法师改云‘差别为性’。”^②

智周《后记》卷上曰“‘或有于此’者,即轨公也。”^③文轨是京师庄严寺僧,师从玄奘,将“差别性故”改为“差别为性”,就是他的发明,而吕才则因袭其说。嵩山镇国道场定宾律师《因明理门论疏》卷二曰:

然轨法师本亲禀承三藏,译论云“差别为性”;后有慈恩法师亦云亲承三藏,论本应云“差别性故”。今译梵本,盖有两异……两本会通,不相违也。^④

此说大误。窥基所谓“辄改论文,深为呵责”,说明玄奘法师在与吕才对定时曾着重对此问题进行了批驳。文轨之改译文,是由于对原典有其自己的理解,而吕才因袭其说则别有用意,所以窥基才会痛斥其“直违因明之轨辙”、“诋后徒之幼识”。

从前引段成式“因重申所难,一一收摄”之语分析,玄奘在对定时所指出的吕才的错误,基本上就是明浚《还述书》中所列举的几个方面。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吕才对因明的一些基本概念还没有能够弄清楚,所以吕才在生因与了因、宗依与宗体、喻依与喻体等问题上会犯很多常识性的错误。有鉴于此,吕才对三法师所提出的40多条立破可以视之为无本之木。明浚曰:

举非四十,自无一是,自既无是,而能言是;疏本无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为是所是;是是恒非,不为非所非。以兹贬失致惑病诸。^⑤

这种批评当不为过。

除了在因明学基本概念的理解上出现偏差之外,吕才还有随意比附的地方。明浚曰:

胜论立常极微,数乃无穷,体唯极小,后渐和合生诸子微,数则倍减于常微,体又倍增于父母,迄乎终已体遍大千,究其所穷,数唯是一。吕公所引《易系辞》云“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云此与彼,言异义同。今按:太极无形,肇生有象,元资一气,终成万物,岂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类欲显博闻,义乖复何所托!设引大例,生义似同,苦释同于邪见,深累如何自免;岂得苟要时誉,混正同邪?非身之仇,奚至于此!凡所纰紊,胡可胜言!特由率己,致斯狼狈。根既不正,枝叶自倾;逐误生疑,随疑设难,曲形直影,其可得乎?^⑥

《易系辞》阐述的是无形生有象的思想,而胜论则认为万物的起源还是有形的,两者在万物起源问题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明浚对此的批评无疑是恰当的。

五 对于僧俗之争的评价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吕才《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往往评价过高,并指责佛家对吕才的批评是出于门户

① 窥基《大疏》卷二,台湾智者出版社1990年版,第77—78页。

② 《大正藏》第44册:慧沼《因明义断》日本,1934,145中。

③ 《大日本续藏经》第1辑第87套第1册,智周《因明入正理论后记》,日本1912年版,第7页左上。

④ 原书佚,《大正藏》第50册[日]藏俊《大疏抄》卷8,日本1934,265上、中。

⑤ 《大正藏》第50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8卷,日本,1934,265上、中。

⑥ 《大正藏》第50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8卷,日本,1934,265中。

之见。如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说“吕才对于神泰等三法师的《义疏》,既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可视为批评的改造;把‘师等旧说’和自己‘新撰’并存下来,以‘共相比较’,足让其在对立中显示尊重真理的科学态度。吕才‘新撰’的观点,有破有立,有体裁有注有解又有论,有形式有文也有图,应该是一部细致严密的独创性逻辑学著述。”^①又有学者说“只是由于玄奘思想的宗派性和保守性,而又得到皇帝的支援,他对这次僧俗间的争论不可能作出公正的‘裁决’;这样,吕才的一些创见也就被扼杀了。”^②上述说法都有言过其实之嫌。《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在著述体例上或许有其特点,但是仅仅根据这一点,怎么可以判断出这“应该是一部细致严密的独创性逻辑学著述”呢?这一推论本身就毫无逻辑可言。

需要说明的是,吕才的《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只是一部《因明入正理论》的注疏,他的所有立破都是针对三法师的,而不是针对《因明入正理论》本身的,属于对因明学理论的理解问题,所以吕才不可能产生什么因明学方面的创见。唐初,因明学通过玄奘法师的努力传入汉地,学人们只能接触到少数几部玄奘法师翻译出来的原典。由于这几部原典文字简约晦涩,不经过玄奘法师的口授,学者们是不可能系统掌握因明学理论的。神泰等三法师在得到玄奘法师亲授的情况下,尚且在若干地方对原典产生理解上的偏差,吕才仅仅依靠三法师的注疏,就要提出比玄奘法师更为高明的见解,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从现存唐人的因明注疏看,玄奘法师所传因明学体系在整体上是系统而科学的,在对原典的理解方面也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偏差。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吕才在因明学方面还会有什么更精深的见解。

笔者认为,吕才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的精神是可嘉的,学术问题本来就应当允许自由探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吕才受条件限制,在一些基本概念方面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所以,我们切忌对吕才和他的著作进行不合乎实际的评价。

(责任编辑:初 阳)

①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7页。

② 蔡伯铭《吕才与因明》,《因明新探》,第204页。

one part of the nation's Europe and Asia strategies, and the main purpose was to exercise sovereignty in Western Regions.

Imperial Yue Ling and Local Shi Ling in Dunhuang Regions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YU Xin, ZHOU Jin – tai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literature about shilling (season) in Dunhuang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kinds: one is Yueling issued by the central dynasty and the other is local Shiling generated 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features of Dunhuang. The season knowledge shows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regional scales. The nation's political symbolic meaning and folk practical meaning of season met in Dunhuang literature and formed two main aspects of season knowledge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On a Monk – folk Dispute in Hetuvidyā (Yinmin Studies) History

SHEN Hai – bo

When Hetuvidyā was first introduced into China, people had a lot of problems in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zing it. In 655, the 6th year of Emperor Gaozong of Tang dynasty, a monk – folk dispute occurred when medicine official Lv Cai wrote a three volume book to question the Yin Ming Ru Zheng Li Lun Annotated by disciples of Xuanzang. This paper studies in details about this dispute and puts forth some new idea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views in this field in the academic world.

Patronizing the "Enemy Country": the Promo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the Guan Yu Worship at the Jiangnan Area in the Ming Dynasty

BAO Shi – qing

From the Ming Dynasty, Guan Yu Worship gradually was out of its previously spontaneous and disorderly stage. Guan Yu Worship and Guan Yu temples penetrated like islands into vast Jiangnan area, and eventually incorporated the "Enemy Country" into its asylum system, thus facilitate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Guan Yu Worship by the Qing central government.

Probing into the False Declaration Case about Purchasing Grain in Urumchi during the Reign of Qianlong Emperor

FANG Hua – ling

In the forty – seventh year of Qianlong (1782), the false declaration of grain purchase in counties like Dihua, Urumchi was uncovered. The Qing government promptly prosecuted over 20 officials embezzling money of the national treasury. These officials, including high – ranking ones, were sentenced to death or removed from the office and confiscated property, even their sons and grandsons were severely punished.

Re – discussing the Assimilation of Immigrants into Pingxiang in Middle Qing Dynasty

LING Yan

Since the middle of Qing dynasty, a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s got Hukou (registered residence) of Pingxiang, Jiangxi Province. But this kind of assimil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early Qing dynasty. It i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such organizations as Tuhui, Jiahui and Yici, and needed to sign contacts on both the Jia and Tu levels.

On Gramophone Record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GE Tao

Gramophones and records as new carriers recording voices were soon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by Chinese after they were introduced in China. They had exerted wide and sophisticated influence on social urban life. In the meantime, with various political powers stressing publicizing functions of records, the world of gramophone records was also the world of politics. As historical records, gramophone records not only mirrored the popular culture of modern cities but also many aspects of social changes in modern China.